

19.11.02

佛岡文史

第六輯



佛岡县政协文史组编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目 录

一、哲人其逝 风范长存

——我县爱国民主人士黄开山先生……廖栢昭 (1)

二、先父刘达华行略

……………刘恩锦 (13)

三、满园桃李慰春泥

——刘诗三一家铁闻……………黄敬文 (21)

四、钟贞漓先生事

……………钟炉祥 (36)

五、悔人不倦的何憩棠先生

……………范济民 (41)

六、宋铨山小传

……………宋礼遂 (45)

七、法学博士——罗奇才

……………郑中品 (49)

八、朱佑汉先生二三事

……………朱乾太 (52)

九、佛冈武林人物范少威小传

……………范育中 (55)

十、大革命时期的佛冈留省同学会

……………范桂霞 口述 (67)
周郁明 整理

封面画图……………廖凤仪

刊名题字……………刘恩锦

哲人其逝 风范长存

——我县爱国民主人士黄开山先生史略

廖栢昭

在我县的爱国民主人士中，黄开山先生是一位令人敬重和怀念的先哲。解放后的1951年，先生受任为清远县副县长时，笔者适供职于工商科，承拟文稿，均由先生审阅，因常得领诲于先生；并于公余之暇，共话桑梓。深感先生之道德文章，情操风格，有足多者。

先生含恨撒手尘世，于今十又八年，缅怀前贤，情所难已。用将个人所知，复参阅《黄氏族谱》所载先生早期的行事节略与《清远县革命历史资料》所载有关先生生前的事迹，综合整理成本文，以表对先生的一瓣心香。

先生名毅，字开山，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生于本县四九区田心乡的一个小山村。父名朝恩，是清光绪年间的附贡生，广州自治讲习所毕业，曾任广州谘议局议员、清远全县团练

局局长、从化县长等职。先生有四弟二妹：三弟劲秋早年曾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运动，抗战时是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滙江支队的主要组织者及领导人之一；四弟锵鸣于抗战开始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积功升师级干部；五弟磊光为地方革命干部。妹二人均早孀逝。

先生少有大志，专心求学，不问俗事，常以非常人自期，其父兄咸笑之。少时就读于清远县立高等小学，后考读广府中学，每试辄列前茅，于民国元年（1912年）以最优等第二名毕业。当时革命军起，先生从戎气盛，入陆军速成小学，后改读公立法政学校。1913年，被选送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本科。留学期间，并被选为广东同乡会会长及评议长。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在表面上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实际是新樽装旧酒，国柄仍由袁世凯所把持。袁世凯在篡夺了大总统职位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积极进行称帝活动。在留日学生中，亦出现拥护民主革命与主张复辟帝制两派。先生与进步同学一起，举办《新潮》杂志，猛烈抨击袁世凯甘冒天下之大不讳的罪行，积极宣传民主革命真理，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因此遭过日本政府的拘禁。

1918年7月，先生以优等生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取得政学士学位回国，8月，由朝鲜经东北抵北京，浏览长城，9月回广东。

1919年，先生任广东省第二届议会议员，《新民国报》政论主笔、《黎明通讯社》社长时，对鼓吹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均不遗余力；而对社会的黑幕，军阀的专横，却常敢于进行口诛笔伐。1921年，先生任广东省议会候补议员后，对省议会中的大事如女子参政、反对交易所、驳斥市政条例、修正县自治案例等问题，均为先生所主动提议。而主张联省自治之广东省宪法草案，亦由先生所主稿。后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全国政治训练所时，派陈铭枢任所长，先生任副所长。1929年，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被任命为汕头市政厅长，新会县长，1931年至1933年调任连县县长，他勤政爱民，卸任后任第八军政务处长（少将衔），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总干事等职。洁身自重、不阿权贵，不畏强暴。有两件轶事，至今犹为知者所乐道。

一是在汕头市政厅长任内，该市发生过德国、美国侨民强霸地产的案件。这些外侨、依

恃本国淫威、视积弱近百年的中国如无物，为所欲为。对此，那些恐外病患者对之不是噤若寒蝉，便是委曲求全。而先生坚持爱国反帝立场，拍案而起，不怕威胁，排除干扰，果敢地作出正义的决断，维护了祖国主权的尊严。可是，当局却害怕因此横生枝节，仅三月即调离先生。

二是先生在任连县县长时，县内有豪霸二人，都豢有一批爪牙。他们朋比为奸，左右官府，鱼肉百姓，路人为之侧目，而历任县官，姑息养奸，更加助长他们的邪恶气焰。先生抵任后，没有迎合他们，因此惹恼了这两个土皇帝。他们扬言要派人刺杀先生。事为一老实农民所闻，急暗向先生举报，请为提防。先生冷然一笑，连夜翻阅历任有关案卷，果见控诉这两厮罪行的状词，连篇累帙。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两人逮捕归案，据实报请上级批准，以之明正典刑。先生这一大仁大勇措施，使历年横行霸道的群歹消声匿迹，而群众则深感先生为地方清除了两大害，额手称庆，誉为“清正严明”的好县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行径，

引狼入室，煮豆燃箕，使国家民族日益陷于危亡境地。先生对统治当局的倒行逆施，深感痛心疾首。

1936年12月，我国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诚两位爱国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当时东北少壮派军人都主张杀掉蒋介石，而南京政府又下令对张、杨进行讨伐。这一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已成为关心国事者日夕议论的中心。那时，先生闲居在广州，尝与友人议论这一问题。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步步侵略，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迫切须要举国一致御侮图存。蒋氏过去虽铸成大错，但仍不失为一个可以驾驭国民党各派势力的中心人物。如果他能改弦易辙，团结抗战，就应释放，否则国家将陷于四分五裂局面，导致日寇加速并吞中国。但依南京政府的做法，亦会置蒋于死地。双方必须以大局为重，万不可凭一时愤激各走极端。”先生这一论点和分析，使听者为之首肯。

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努力斡旋，使“西安事变”事件获得和平解决，开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新局面。从此，先生深切体会到要救亡图存，唯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

英明领导。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深表拥护。次年6月，他的四弟锵鸣（涛）向他表达要去延安参加革命的决心，他高兴地说：“好嘛！象你这样的老实人，在这个社会是吃不开的。唯有奔赴延安才有出路。”短短几句话，充分表露了先生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倾向和对国统区社会的贬责。

当时受到先生积极支持、鼓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除他的胞弟外，还有做过他勤务员的李振生以及汤塘青年学生周耀明、黄刚等人。这批热血青年，没有辜负先生的殷切期望，在到达延安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哺育下，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血与火的考验下，得到了茁壮的成长，分别当上师、团级的领导干部。

先生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响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送给八路军驻粤办事处。

1938年，广州沦陷前夕，先生邀知名人士陈大年回故乡田心村居住。他还热情满怀地指导本乡知识青年与广州来的学生团结在一起，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暑假时间，以中共

地下党滙江抗先支队的名义在联升乡战时中心小学开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先生欣然应训练班之邀，为学员们讲学。扩大了训练班对社会的影响，为滙江地区革命工作的开展作了可贵的帮助。

广东省政府撤到韶关，李汉魂主政，任先生为省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秘书，他针对当时政府人浮于事，政风颓败的现象为文提出中肯的评论及意见，发表于某进步杂志（刊名已忘记）。

1942年5月，先生出任清远县长，当时，国民党右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逆流，中共地下省委受到了破坏，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日趋尖锐复杂。先生对此，“心有灵犀一点通”。上任之始即给共产党人大放绿灯。他安排中共地下党员、堂侄黄化民担任收发，掌握印鉴，参与重要会议；还委派黄信明、黄礼昂、黄绍周、何玉琼、黎沃能等分别到各单位工作，给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带来有利条件。

1943年冬，先生因拒给一武装走私集团要求开具通行证明，被国民党驻军某团长公然派兵夺印，他本不为淫威所惧。但目睹军人集团跋扈专横，互相勾结，大发国难财。政局沦于黑

暗腐败，认识到独清独醒，无济于事，遂不赴韶关述职，愤而拂袖回家。

先生家居以后，没有寄傲烟霞，枕流漱石；而是在野不忘抗日，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与中共地下党的来往更为密切。中共北江特委委员陈枫、潞江县委黄渠成等同志已成为他故居的常客。

1944年秋，东江纵队邬强部首次取道潞江开赴粤北，在鳌头乡黄茅马骝山受到挫折，继而面临地方武装，各乡团队围攻，情况殊为严重。此时先生依照潞江地下党的紧急呼吁，立即作出努力，对受蒙蔽上当的本乡团队晓以抗日大义，阵情力谏，让他们勿做亲痛仇快的蠢事。从而分化瓦解了这支临时凑合的各乡团队，及时粉碎了敌人的罪恶计划。

同年冬，日寇进陷粤北坪石，驻守潞江的国民党军队遁走一空。这时，潞江民众抗日自卫团指挥所的某些头面人物，内搞包烟庇睹，走私贩毒、投机倒把的勾当。先生怒群小卑劣，忧家乡的危殆，与地下党活动密切合作，号召联升、联卫、兴礼三乡人民迅速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自卫委员会以领导乡人“自卫卫国、自救救人”。先生的倡导，得到三乡进步人

士的热烈响应，很快建立了“三乡自卫委员会”，机构成立之日，济济一堂，咸推先生为主任。

“三乡自卫委员会”的成立，使中共地下党顺利地掌握了三乡的武装力量。而“滘江民众抗日自卫团”的某些头目却为之惊愤交加。他们机关算尽，玩弄了一出“鸿门宴”式的把戏，即招同县参议副议长等人一起，率着喽啰，“约宴”先生于汤塘，许愿将指挥所主任一职相让，劝先生勿另起炉灶。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软的不行，则实行武力挟持，迫使先生就范。

先生明知宴无好宴，会无好会。但为了表明自己抗日保家的立场，揭露对方倒行逆施的事实，毅然历险赴约。结果在中共地下党武工人员的保护下，先生在会谈席上，据事直陈，义正词严，把对方驳得理屈词穷，瞠目结舌，最后先生安然离席，使县副参议长等人的如意算盘彻底打破。

1945年春，邬强部再度途经从化取道滘江开赴英德建立根据地。这次他们事先和滘江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当部队刚抵达四九、汤塘地面时，就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支持和亲切接

待，从而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先是邬强部刚到从化时，国民党从化县党部书记长即函约先生进行夹击，先生阅函后即将原件交地下党转知邬强，使部队行军知所趋避。东纵司令员曾生为此亲笔致函感谢先生。

同年7月初，滘江区长和保安营长谭砥纯所部奉命奔袭中共从滘县委的主要活动据点四九中心小学，使地下党受到破坏。地下党人群集先生故居，共商应变。中共滘江县委将武装起义的决定征询先生意见，他表示衷心拥护，并鼓励地下党负责人黄渠成：“要准备坚持艰苦奋斗十年，革命一定会赢得胜利”。过了两月，统治当局，恼羞成怒，指令国民党152师派兵围捕先生，幸得先生及时藏匿，才免遭于难。

先生刚脱虎口，又遭诬击，那些与先生政见为背之人，竟又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大肆攻击先生，说什么黄开山这个失意政客，勾结“奸匪”，在地方作乱。他们还积极策动国民党地方上层人士，串连、诱胁滘江各乡的乡长、县参议员等联名呈控先生于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广东省政府，请明令通缉先生。

不久，广东省保安司令部围捕先生于广州住所。同时陷入图圈的还有先生夫人谭素真，

长子达成。他一家四口，仅次子达强因不在家才幸得以身免。

在民间欢度1946年春节那天，国民党军队一个团在县保安警察的响导下，于凌晨包围田心村，捉去先生亲房十余人。在用尽严刑拷打后，惨杀曾当过先生勤务员的黄礼昂于四九圩边。而黄化民三岁的孩子则在包围时被抛落污水沟活活淹死，另一个出生仅廿天的幼婴因其爱人被捉去白白饿死。其余的押解到清城入狱，勒索巨款，才予释放。

先生自抗日战争一开始，则坚持爱国民主立场，致力救亡保乡工作，象这样德高望重的开明人物，在日寇称降，万民交庆的日子里，自己却不能保其身以及其亲。

经过中共地下党及先生友好的营救，先生等于1947年间恢复了自由，息影于从化太平场果园。

先生出狱后，并没有因受到挫折和打击而畏缩低头，消极遁世。他在复友人李丽韶的慰问信中说：“辱华翰，深荷雅存。仆此次蒙难舍垢，系运会使然。此乃自古贤哲，多所不免。某何人斯，敢不泰然……望与地方持正之士，共挽颓风”。字里行间，其宁折不弯，坦荡

无畏的精神，跃然纸上。（注：李丽韶抗战初任国民党六十三军军法处法官，黄开山任清远县长时，委他为总务科长，他对先生素有感情，黄开山出狱不久，他即嘱笔者代为写信慰问。黄开山的复信，我曾看过，还记得上述几句。）

先生被营救出狱后，1948年初，国民党省保安当局在汤塘设立“第四剿匪司令部”。一些人极力请求该部派出鹰犬去从化捕捉先生，幸得中共地下党的暗护，隐避及时，才免于难。

在“风雨如磐离故园”的时候，国统区狼虎横行，荆棘遍地。先生的生命，如临深渊，如履薄水。这时能与先生艰险相扶，相濡以沫者，惟中共地下党人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意气风发地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先后被任命为清远县副县长、广东省参事室参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在反右斗争扩大化时，先生曾被错划为“右派”，后获纠正。1968年，先生达七十五岁高龄时，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所迫害和折磨，身心惨遭严重摧残，含恨离开了人世。1979年，党和政府为先

生公开平反，省政协为他开了追悼会。

纵观先生的一生，从他青年时代由日本学成归来，奋笔报坛，激扬文字；中年时代置身宦海，清廉自重；晚年时代追求真理，不畏艰危，都表现出他爱国具赤子之心，向阳赋葵花之质。他在涅不缁，明于抉择，胸怀磊落，一身正气。虽然哲人其逝，足可谓风范长留。

先生精于古代汉语，行文洗炼，书法类康体，苍劲纵横，不拘一格，惜经十年的文化大摧残，其一鳞半爪，都很难复睹矣。

先父刘达华行略

刘恩锦

先父名达华，字精一，晚号觉是。生于前清光绪三年丁丑（公元一八七七年）七月十六日，终于民国卅三年甲申（公元一九四四年）四月廿九日，享年六十八岁。先父幼承家训，性聪颖，勤奋好学，故弱冠则有文名。清远陈

举人（忘其名、里）器之，允列门墙，优遇殊于他生。愤见时，则举家藏《佩文韵府》全套二十四卷，《事类统》十余册，明摹本《怀素千字文草书》乙帙赠之，曰：“犬子不克继承，今予汝，汝善视之，勿坠吾志。”其所寄望殊殷。岁甲辰（公元一九〇四年，光绪卅一年），以府县双十名次，考取清远县第一名邑庠生。翌年，清廷废科举，兴学堂。乃入府办清远师范学堂肄业。毕业成绩优异，被留委为清远两等小学校校长，民元始离职，在任四年有奇。先是，元配钟氏以病卒，任校长期内续聘清远名绅田贡生之第六女为妻，育二子三女，即先母田氏也。父离职后，得花县族人刘耀岐、铁禅两人介绍，曾参龙济光幕。旋发现龙拥袁叛国，乃弃职而归，才半年许耳。回里后，从事蚕桑业，颇有所得，冀老其身。民五（公元一九一六年），县知事王有戎假凤梧书院旧址倡办两等小学，先父以义不容辞，受任该校首届校长，聘宋子田（本县诚迳大塘人）、刘达志（本县小坑村人）、黄厚之（本县四九人）、曾剑宜（本县佛冈村人）等先生为教员。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首届学生结业，其中如黄起腾、黄英佩、黄多材、钟贞

漓、张仕登、陈植臣等为该班之佼佼者，现硕果仅存之赖超溪同志亦已年过八旬矣。民国九年末（公元一九二〇年）将校务移交于宋子田先生。翌年，在石角人和当铺旧址办精一学塾，专授国文一课。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迁塾址于府城朱家祠内，正式定名为“精一学塾国文专修科”，年招生60名仍有额满见遗者，足见踊跃来学者之多。此期学生中之廖鉴明、刘健芸、刘达荣等思想先进，转学广州或香港后，即加入革命队伍，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献出毕生精力，而刘达荣同志则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州仲凯农校支部书记，于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起义不幸被害，为我县早期之烈士焉。民十四，滘江联、合乡之械斗餘波，延及吉河，刘黄二姓暗酿二次械斗，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先父乃结束朱家祠学务，于民十五（公元一九二六年）回虎望冈创办养正完全小学校，自任校长。由祖尝拨款兴办，不收学费，故全村（指崑冈、高田两自然村。高车、水围两自然村则另办科旺小学）儿童除少数生活无着落者外，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适龄儿童，均可免费入学，享受六年义务教育（此制度一直维持到解放前夕为止）。民十